

17.中B

隨州文史資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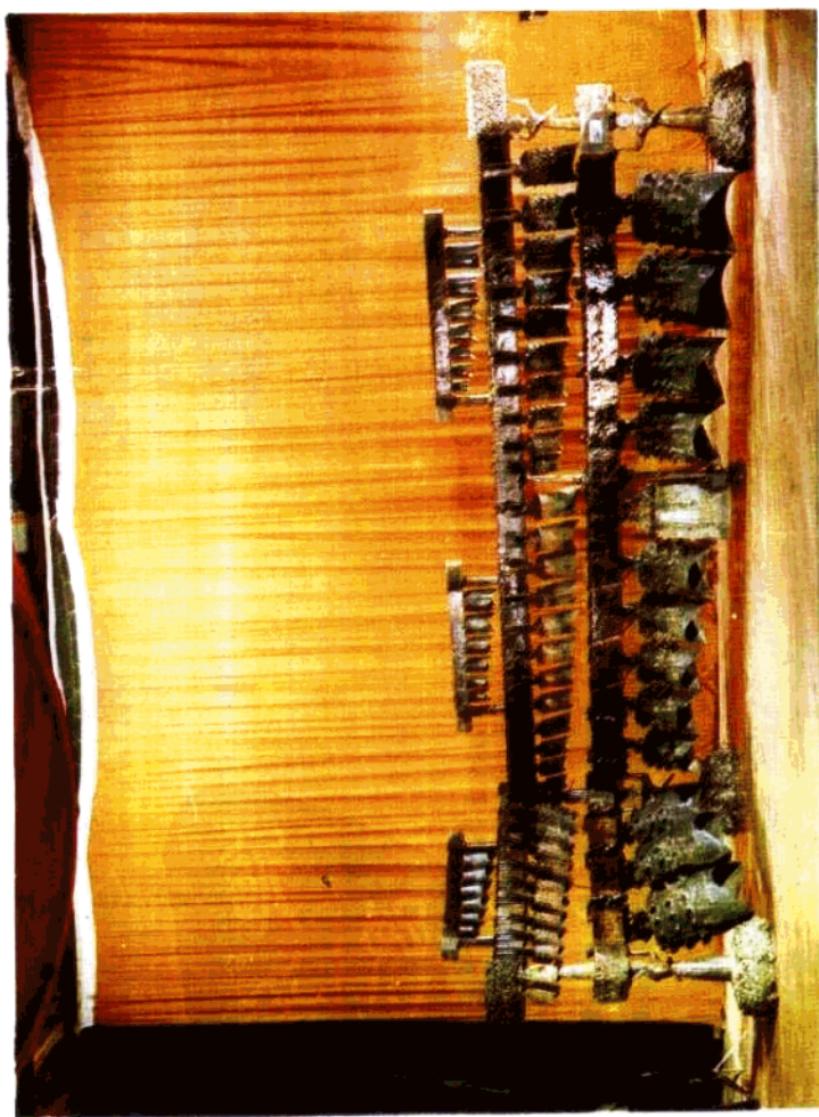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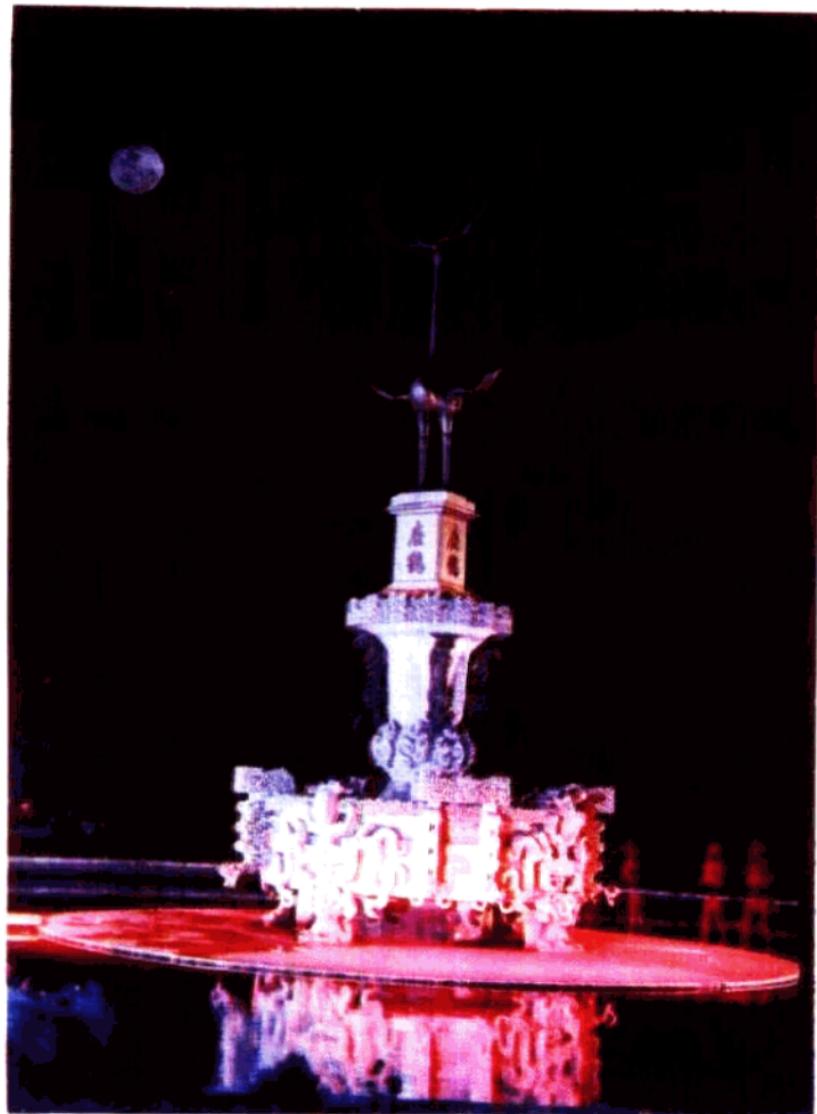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 
湖北省随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（即曾侯乙墓）音乐厅出土的一套编钟（大小六十四口组成）历经二千四百多年，钟架仍完好。

余义明 摄





随州市市标，系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之鹿鹤和尊  
盘组合而成。

余义明 摄

金盖系擂鼓墩一号墓出土，盖高十点七厘米，口径十五点一厘米，重二点一五公斤，盖内有一件镂孔金勺，重零点零五公斤，盖及腹部有精细的蟠蛇纹、陶纹和云雷纹，盖口沿下饰一圈蟠螭纹，三足作倒置的凤首，器形和纹饰都很美观，这对冶金史提前了若干世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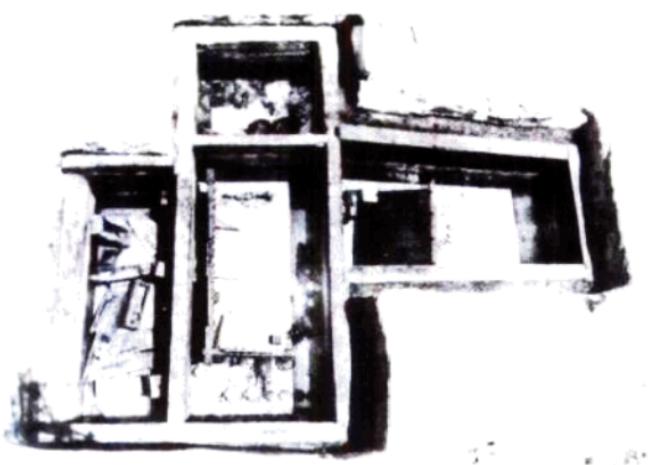
余义明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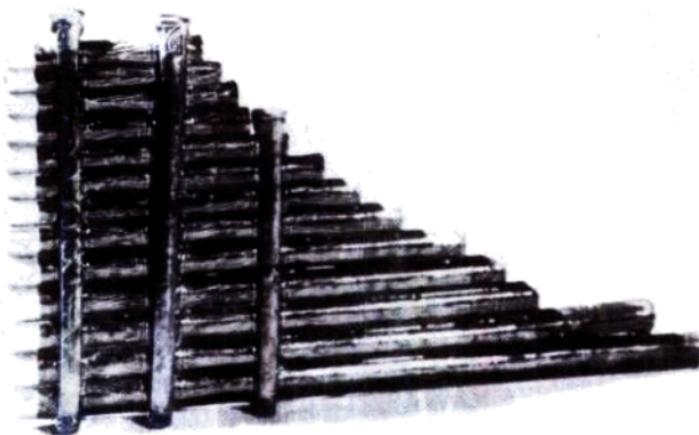


随州市区之文峰塔，重建于清光绪十年（公元  
1884年），塔高为25米，系砖石结构，气势  
雄伟。

余义明 摄



擂鼓墩曾侯乙墓平面图。余义明 摄



擂鼓墩曾侯乙墓音乐厅出土之排箫，发音仍  
清脆、优美、完好。余义明 摄

## 目 录

何成浚将军八十自述	何庆华供稿	(1)
我的父亲	何庆华	(24)
何成浚先生的轶闻轶事	汪觉先整理	(30)
何成浚创办列山中学	谌先生供稿	(67)
护法运动时的何成浚	摘自《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》	(72)
何成浚与杨永泰、黄绍竑主鄂之争	魏元晋	(74)
何成浚与严山谦的斗争	市党史办供稿	(85)
周泽春	曹溥俊整理	(87)
方 维	见 阅	(91)
李继膺	余题铭整理	(94)
张伯烈	傅 进整理	(101)
林翼支	随州地方志办公室供稿	(107)
许学源	曹溥俊整理	(110)
谢石钦	傅 进整理	(116)
商界名流——秦育之	《随县财贸志》编辑组供稿	(120)
随州巨商——秦观楼	《随县财贸志》编辑组供稿	(123)
编 后	随州市政协文史办公室	

## 何成浚将军八十自述

何成浚先生遗像



按：何成浚先生乃国民政府时期的要人。先生的《八十自述》，记述了先生从军从政几十年的经历。先生仅少年时期在家乡生活、就读，长即外出求学、从军、从政，很少归里，故知先生虽众，但知先生经历者甚少，后生知先生者更微。为不没先生之名，使闻后世，故全文转载了先生的《八十自述》。先生文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记述，由于先生职责所在，所述当是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。本书编辑亦不以政见不同而删之。千秋功罪，自有人与评说。苍海桑田，往事可堪回首！“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见一笑泯恩仇。”同为炎黄子孙，何须分楚河汉界。“计利当计天下利”，唯中华民族的崛起，国家的统一，华夏的昌盛，才是中华儿女唯一的素志宏愿。

余世居湖北随县，薄有资产，自幼生活裕如；惟以生当季世，朝政不纲，外侮日急，甫束发受书，即萦心国事。年

十四，赴省垣投考新设之武备学堂，作投笔请缨之想，以年龄身体均不及格，未获录取，怏怏而归。十九岁时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，由学使蒋式棻保送经心书院肄业，旋因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原有之两湖、经心两书院合并为两湖大学，人才荟萃，思潮澎湃，同学中多有志于革命，而湖南黄克强先生其最著者也。黄原为两湖书院肄业生，奉派留日习师范，回国参加先烈唐才常等萍浏之役失败，再行东渡，极力鼓吹革命，为清吏侦知，严令调回，指定居住于两湖大学，盖监视之也。黄常与诸同学纵谈天下事，藉机灌输革命主义与尚武精神。年余后两湖大学改组，同学中之青年有志者，多赴日本留学，余与黄亦先后东渡。黄为储备革命将才计，力劝各同学习陆军。余入振武学校，课余常与黄晤谈，不仅尊礼为同学前辈，实资为革命导师也。翌年承介绍入同盟会，得亲炙总理孙先生。迨后总理赴美，黄返国进行革命工作，而余是时已毕业于振武学校，往名古屋军队中实习去矣。半年后接李书城函转述黄殷殷属望之意，大致谓革命应不忘读书，于军事应更求深造，将来回国始有作为云云。旨哉斯言，发人深省，余乃进入日之士官学校，不遽作归计焉。

余由日学成归国时，士官同学前辈吴禄贞正充延吉边防督办。吴为吾党健者，在日时极友善，拟往投之，冀能共同为党努力；惟当时留学生任用之权操于各省督抚，余为鄂籍官费生，由鄂当局指定服务于湖北督练公所，殊违心愿，然藉此得与鄂中军人接近，亦不无为党效力机会。在鄂供职年余，闻吴禄贞调任第六镇统制，驻扎保定，正拟去电自荐，而吴邀约至电已之，因即请假离开现职，径奔吴处；不料吴保余任第二十三标标统之电，竟未为军政当局所核准，盖以原任标统吴金彪为淮军旧人，派系勾结，根深蒂固，不可动摇。吴

公愤极，据理力争，经军制司长易乃谦出面调处，派余任军制司搜简科科员。吴以陆军部为军事最高机关，革命党人得置身其间，潜伏工作，亦甚佳事，余乃受命。任部曹之次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广州黄花冈之役作，陆军部军制司首先接获两广总督张鸣岐告变之电，宣读电文者为科长蒋作宾。电文云：“匪徒围攻督署，正调兵围剿。”又云：“匪首黄兴当场击毙。”等语，司员闻之，有泣下者。后接第二次来电，报告乱事敉平及党人死者姓名，而不及黄，又私相庆慰，盖全司数十职员，已半数属于党人矣。

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，是时陆军部方忙于永平秋操，初未料及鄂事之遽发。二十日军机处转据陆军部告变电，开紧急会议，决定派荫昌为总司令，易乃谦为参谋长，并派余为一等参谋。余是日适未到部，傍晚谒见荫昌，渠谓：“现在举行秋操，抽调大兵颇费时日，我不能即时出发，汝是湖北人，可带两标先去。”余答以责任太重，兵力太单，应请先示机宜，俾免临事有失。荫昌谓第一须保住黄河铁桥，如黄河铁桥无事，便进一步扼守武胜关，果能守住武胜关，则其他非汝责任内事矣。余闻之窃喜，盖仅守此范围，则鄂军得从容设防也。即晚率同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乘车南下，过黄河铁桥，过武胜关，一路平安无事。二十一日下午开抵黄陂县属之祁家湾，面谕第一标标统李倬章与第二十四标标统马继增在附近觅地宿营，静候总司令命令，再定行止，在未奉到命令前不得妄动。祁家湾距汉口仅九十里，车行一时可达。张彪闻讯，派中军官李泽湘来迎，余偕往见瑞徵、张彪、萨镇冰于海圻兵舰。瑞徵带多少兵来，余答仅有两标，瑞徵失望。旋强自镇定曰：“有此兵力足矣，武昌本乌合之众，呼啸而起，一切茫无头绪，现虽

拥黎元洪为都督，黎尚不敢就职。哗变之军队不过工程营一小部分，其余步兵第三十二标，炮兵第八标，以及骑兵营、辎重营，均未叛变。汝率两标劲旅，由兵船掩护，自阳逻地方渡江进攻，平定乱事如反掌耳。”余曰：“孤军深入，兵家所忌，出发之时，荫总司令已有切嘱，不敢违令渡江进攻。”瑞曰：“一切责任由本督负之。”余仍不为动。萨镇冰在旁默然。张彪则力劝渡江，并极言武昌之兵多数未变。余正色驳之曰：“既是武昌之兵多数未变，汝何不留驻武昌指挥定乱，而乃离开汛地，避居兵舰耶？”张闻之赧然语塞。瑞则面有怒容，厉声向余曰：“汝不肯渡江，我即电告荫总司令，恐汝难逃畏缩不前，贻误戎机之咎！”余曰：“我当静候荫之电令，荫令我如何即如何，他非所知也。”言毕下船回祁家湾车站，当即电荫，谓革命军声势浩大，我兵单不敢轻进；瑞督责难綦严，请示如何处置？次日到汉口遍访故旧不得，忆及曩在督练公所时，曾与一般肝胆相照之同事往来于汉口英租界之福昌旅馆，因到栈访问，亦失所望。一江隔绝，无法与武昌方面互通消息，殊为怅怅；而武昌首义同志固绝未料及北庭南征部队竟由余统率而来也。由汉返祁家湾，得荫复电，嘱仍照原计划办理。有此一电，则余顿兵屏障义军之计已售，不复顾虑瑞激之告讦与责难，私衷深为庆幸。盖武昌兵力太单，军心未固，如遽临以节制之师，必不能守，革命初发之花，又将毁于一击，幸而缓兵之计得售，不惟个人赏心快意，实亦国家民族之福也。越十余日，荫昌领重兵南来，革命军亦已渡江布防，荫令王占元率第二镇第三协全部及炮兵一标，进攻汉口。承平日久，兵不习战，王占元率部乘火车前进，既不搜索，又无警戒，车过三道桥，被潜伏铁路附近学生军数十人开枪射击。北军官兵闻声慌乱，有

跳车逃走者，有高呼后退者，司机为士兵所迫，将火车向后倒开，而后面路轨已被铁路工人拆毁十余丈，车退至此，轰然一声，倾倒过半。民军由稻田跃出，奋勇围攻，北军死伤枕藉，狼狈奔溃。惜民军兵力有限，未能紧追不舍，否则王占元全军覆没矣。王氏退却时恼羞成怒，在附近绑去农民十余人，诬为侦探，押解总司令部参谋处，一面报告军法处，请从严讯办。军法处根据王之报告，向参谋处提人，参谋长易乃谦交余照办。余以王占元送来之人，经我详细办讯，都是善良百姓，绝非侦探，已一律开释矣，等语复之。易闻言作色曰：“不经军法处审讯，便予开释，设若总司令追究责任，将奈何！”余曰：“责任我自负之。”荫昌获悉此事，果向余厉声诘责，余亦盛气作答曰：“王某临阵失败，不自引罪，必乃迁怨于人民，可乎？”荫闻言默然，而愠怒之色不稍解。此后便有宪兵营长张莹时常睥睨于余左右，盖奉荫之命监视余也。环境虽极险恶，余处之亦殊泰然。

荫昌顿兵黄孝，迟延不进，武昌革命军乘时扩张，且得各地独立响应，声势日盛。清廷知荫昌不能有为，起用袁世凯当国，派冯国璋南下作战。冯部猛攻汉口，革命军势不能敌，汉口、汉阳先后陷落，荫昌无颜再领兵符，请准回京。余以返里省亲为词，向易参谋长请假。易闻之勃然变色，与余附耳言曰：“张营长时在汝侧，汝宁不知之？鄂省已遍地动乱，汝为鄂人，此时请假回乡，非表示将往参加革命军而何？是自速其祸也，应即决定与我等同回北京，否则殆矣。”余受兹面训，深感成全之谊，遂决定先回北京，再作他计。到京晤蒋作宾，承告吴禄贞已被任为山西巡抚，蓝天蔚驻涿州，跃跃欲试，与驻石家庄之吴部第六镇息息相通。吴此去山西，必有动作，曷往从之？余依其言，但当时通信困难，

拟先电吴道意而不可得，决定径行奔投。临时有自石家庄来者，言吴已发表余为参谋长，闻之极慰。不料到车站竟无票售，在站守候至晚，停止售票如故，正疑虑间，忽闻市上叫卖号外，惊悉我衷心敬佩决意投奔之吴绶卿先生已被刺死矣。晴天霹雳，震悼曷胜！因知清廷以武昌首义之故，切齿于鄂人，袁世凯当权，手段毒辣，北地未可久留，当晚买车往天津，由津转沪，谒黄克强先生于南海邑馆。其时南京已光复，独立各省决定设临时中央政府于南京。黄先生嘱余先往预备一切，并以亲笔函介余往见徐绍桢商洽应办事项。余到南京未久，总理孙先生偕黄先生莅止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。

总理任临时大总统，黄任陆军总长，余任陆军部副官长。黄先生赞襄总理统筹全局，事务特忙，所有陆军部关防印章，悉以付余，部务大都委余裁决，信任之专，至足感念，迨后南北和议告成，临时政府改为南京留守府。黄先生受任留守，因须亲送总理赴沪，而以组府之事付托于余。讵留守府尚未组成，而驻南京城内之赣军忽然哗变。余一面电告黄先生，请其回京镇慑，一面挺身负责，调郊外驻军王芝祥等部进城定乱，咄嗟之间，事变平息。迨黄回京，秩序已复，黄深庆付托得人，余亦颇自慰也。袁世凯予智自雄，不容有革命势力之存在，藉口经费无着，裁撤南京留守府，计自成立以迄裁撤，为期仅三越月耳。袁氏摧残革命，排除异己，履霜坚冰，其来渐矣。黄先生原无意于作官，雅不愿因一己地位之争，与北政府发生冲突，毅然解联回湘，余亦得卸仔肩，回鄂休息。

余回鄂未久，旋接黄函，知其受任全国铁路督办，并嘱余为其驻北京代表，负与各方接洽之责，尤注意与本党国会

议员多取联系。余持黄函入京，见袁世凯。彼貌示优待，口询黄先生何时北上，议会中人多希望其速来云云。猜忌之意，溢于言表。民国二年宋教仁在沪被刺，北京舆论哗然，报纸纷纷揭载刺案内容，痛诋袁氏险狠残毒，余认为必将激起政变，北京在目前情势下，非可以有为之地，尤非革命党人可以安居之处，决计离京。黄亦由沪电促南下。袁氏侦悉，殷勤约晤曰：“闻言将有上海之行，不胜依依！宋案发生，不仅为国民党之重大损失，就国家言，亦至不幸。政府对此案，一定缉凶严办，希向各方转达此意。”次日再邀餐叙，又谓现有要职借重，希望打消回沪之意。余坚拒之。袁又谓君去志既决，未敢强留，希望仗君之力，代政府解释一切，或可化戾气为祥和也。临别送余皮袍一袭，路费数千，并谓已嘱梁士诒电上海交通银行，尽量供应在沪交际费用矣。余唯唯称谢而拜受之，盖稔知袁氏奸险作风，对于政敌利诱不成，则暗杀随之，宋遁初坚主责任为内阁制为袁氏所不能容，临别复却其馈遗以示决绝，遂使袁氏不胜羞愤而启杀机，覆辙在迩，余不能不引以为鉴也。抵沪未久，江西李烈钧宣告独立，东南各省纷纷响应。余奔走上海、南京间，多方策动，江苏亦告独立。不幸驻徐之第九师战败于前，增援之第八师继溃于后，而南京城内防军复被北政府分化收买，致变乱迭起，无法控制，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势所迫，通电取消独立，赣、皖、粤等独立政府未几相继瓦解。各地大举讨袁之役，竟不旋踵而败。革命大业受此顿挫，良可慨也。

讨袁失败后，总理与黄克强先生暨同志中之锋鋩较露者，都流亡日本东京，余亦与矣。国内议会解散，自治取消，民气消沉，暴政日甚。革命党人虽远适异域，不能忘怀家国，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，固未因失败而稍馁也。黄先

生由日赴美，争取国际友人，联络侨胞志士，而以与留沪同志共患难，伺机活动之责任属于余。大义所在，虽力不能胜，亦遵嘱回沪，勉为其难。未几，陈英士先生亦回沪，彼此过从甚密，一切互相商讨。历时两载，备尝艰险，多数同志蜷伏于危楼一角中，有求日食馒头一枚、开水一杯而不可得者，有被恶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终者，在此恐怖恶劣环境下，与北洋军阀恶势力作殊死斗。英士先生屡率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，前仆后继，牺牲惨重，终以策动变乱过急，误受鸿运公司之诱惑，致为军阀恶探所暗算，惨遭杀害。革命未成，费志以歿，至今思之，有余痛焉！袁世凯多行不义，终至众叛亲离，忧愤以死。黎元洪继任总统，函邀黄先生入京。黄嘱余先往察看情形。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，约法等于废纸，知不可为，迅即离京。未几，大借款案发生，国会再被解散，政象日趋败坏。黄先生蒿目时艰，忧心如焚，致患脑溢血症逝于沪上。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不仅余一人之私恸已也。

国会二次解散，全国舆论哗然。总理回到广东，召集国会，组织护法之军政府，命余负联络各省军队之责，嘱特别注意余之故乡湖北，盖以湖北居形胜之区，控长江上下游，动静关天下安危也。其时湖北革命武力之硕果仅存者，为驻荆沙之石星川师。该师旅长朱兆熊、团长胡廷佐尚保有革命思想，亟欲驱走鄂督王占元，树湖北独立之帜。所部中下级干部，亦均跃跃欲试。其迟疑不决者，石师长一人而已。余潜往沙市，力加策动，独立之旗遂以树立。王占元派旅长王都庆及驻在宜昌之师长卢金山，分由长江上下游夹击沙市。接战旬余，战局不佳，石师长弃军宵遁，干部动摇，有崩溃之势。余建议朱兆熊收军渡江，与湘西革命势力相结合，以保

存实力。湘军总司令程潜、师长赵恒惕、湘西督办李书城，皆党中健者，亦余之老友，须能患难相扶也。朱不能纳，背余而逸。所遗部队散布各县，有如一盘散沙。余见事急，当仁不让，攘臂而呼，派员分途招集，闻风而从者数千人。余率之逾江而南，在常德编成两团。然余之任务在奔走各方，未可少许部队羁栖一隅，因湘西督办李书城为鄂人，为革命党员，且与余为老友，特请其接收余自荆沙带出之部队。李以与此部队毫无渊源辞。余允暂留任高等顾问以为之助。李感余诚意，始允接收，而曰：“吾辈军队皆属于党，我与兄同负其责可耳。”

当余自荆沙移军常德时，北军已进逼岳州，情势极其紧张，程总司令电请李督办火速派兵驰援岳州。电到，李适离常，无人作主，余见事态严重，复本当仁不让精神，以高等顾问资格统率原所带来军队赴援。至时，见城内遍地皆兵，而敌人相距尚远，又接程总司令急电，嘱改守汨罗江以阻敌前进，盖据确切情报，敌人须于最短期间越过汨罗江也。余依其言，移军汨罗江，驻一星期，敌军至矣。余布防铁路两侧，敌人从上游詹家渡过河，对我军采包抄形势，我军感受重大威胁，势非撤退不可，闻长沙已无军队，乃率兵开进长沙。日本驻长沙领事来谒，谓张敬尧大军即将进攻长沙。彼愿以日本轮船运送余之部队过江。请速退出长沙，以免战祸。余谓为顾全人民生命财产，愿受贵领事劝告，避免与北军在长沙城市区作战；惟须保证俟我军渡江完毕，始让北军进城。日领慨允负责保证。余即率军安全渡江，由岳麓山转进，与李督办书城相会于永丰。湘军主力集于株洲，余奉命守朱亭，拒敌数日，忽电讯不通，情报亦杳然，盖株洲已失，余未之知也。所部团长夏斗寅、张笃伦等以奔驰劳顿过

甚，病不能兴。余一人统率孤军与强敌周旋，不得不特加警惕。一日余带兵弁数人上山察看阵地，并派人四出侦察。俄而侦查者回报，朱亭附近之黄龙桥附近已有敌人踪迹。余念黄龙桥在我军后，何得有敌？正疑讶间，忽见上游有小火轮来，即派人拦问消息，始知衡州亦不守矣。余军此时所处地位，左边大江横亘，前后俱是敌人，无法可守，无路可退，惟有督饬收拾装具，准备明晨突围。讵知入夜愈深，敌来愈众，三面严密包围，清晨登高瞭望，敌方无懈可击，然为死里求生计，仍不得不冒险一冲，而前锋数十人在敌弹如雨的情况下，迫得退回阵地。正焦急间，忽阴云四合，大雨倾盆，余喜极曰：“此天佑我军也。不速冲出，尚待何时？”怒吼一声，全军振奋，踏破敌阵向郴州猛进，虽死伤颇多，而部伍不乱，亦云幸矣。

广西总司令谭浩明驻军湖南，暗通北方，居然通电反对总理，签署在湘各将领名衔于电尾。有人持稿示余，询能签署否？余正色拒之曰：“余为国民党员，为中山先生信徒，大节所关，头可断，名不可署。”谭未相强，然从此不便再相处矣。因语李书城曰：“此间不能一朝居矣。”李曰：“将何之？”余曰：“到革命策源地广东去。”遂将部队付书城，只身逾岭而南。比至广州，总理已回上海，因又赴沪谒总理，报告转战鄂、湘经过。总理温语慰勉，嘱在沪稍事休息，迨谭组庵攻回长沙之消息传至沪上，总理笑谓余曰：“得毋拊髀增感耶？今又有事劳君矣，烦以我之代表名义长驻湘垣，与组庵密切接洽，并兼负联络川、鄂两省责任。”余奉总理命，克日驰抵长沙。吾鄂党人集结长沙者众，时与计议援鄂问题，颇具端倪。至民国十年，四川刘湘出兵与鄂省军人之在鄂西者联合，以援鄂驱王相号召，专函邀余前往，词意